

香港三聯傾全力出版王世襄明式 家具專著始末*

2014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分別出版了田家青著《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2015年底，我才獲得這本書，最近才有時間拜讀。田家青是王世襄先生的唯一入室弟子，為了紀念王世襄先生誕辰百周年寫成此書，以富有師徒深情的語言詳細地介紹了王世襄先生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和日常生活，讀來回味無窮。唯對當年香港三聯書店發現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著作並設法介紹到世界各地的過程則隻字不提，反而以「無奈的合約」為題，刊出對當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聯之間的合約表示不滿。因此，我不得不將當年香港三聯出版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著作的過程如實縷述，展示真相，以正視聽。

* 此文原刊於北京《中華讀書報》2016年5月18日。

十年磨一劍賈島卅稔攻兩書鑿枘雅漸審
老眼已模糊喜有蘭陵君綴輯成畫圖椅
凳几桌案美器眩無餘鏤工侷漢璧光燦
如隋珠形影化千萬四海皆驚呼從此言
明式不數碧眼胡君我堪吐氣心懷一時
舒

珍藏出版研究亦在編印中戲作俚句寄以博

滋老一祭 丙寅初夏 逸安王世襄

王世襄兩部明式家具專著的出版過程

《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是已故文物學者王世襄先生眾多的文物著作中最負盛名的兩部專著。這兩部著作由香港三聯書店先後於1985年和1989年出版中文版，暢銷港澳台及海外各地。其中《珍賞》還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還曾有台灣版。隨後兩書又先後譯成英文，並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珍賞》授權英、美、法、德等國出版社先後出版英、法、德等外文版，《研究》則出版了英文版。這兩部巨著，展示出明式家具的典雅優美，吸引了萬千愛好者，因而掀起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熱潮，成為中國和世界各地文物收藏家的重要藏品，而且進入蘇富比、佳士得等國際馳名的拍賣行，香港也出現葉承耀、劉柱柏等著名收藏家以及田家青（北京）、馬未都（北京）、伍嘉恩（香港）等研究學者。我不了解海外情況，深信也應會湧現不少研究者。王世襄先生的絕學後繼有人，也可無憾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已擔任中資出版機構香港三聯書店的總經理。隨着內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出現改革開放的大趨勢，港澳台以至海外各地，尤其是知識分子普遍對中國內地投以關注的目光，於是掀起一股中國熱，香港出版事業的黃金時期到來了！

其時，內地的書刊對外出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尚未正常化，但香港三聯則早已通過自己的渠道獲得充分

的供應。我們逐漸認識到，光靠銷售內地出版物，已不能滿足港澳台以及海外的華人和外國人士認識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現狀的需要。今後應以繁體字多出版各類圖書。除中文版圖書外，還應適當出版一些以英文為主的外文圖書，設法進入國際市場以滿足外國人士和部分華人的需要。於是立即擴大編輯部。但稿源還得靠內地出版機構支持以補香港稿源之不足。其時中資出版機構已組成以藍真先生為首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總管理處。他也十分重視加強香港的出版工作，並組成組稿團於八十年代初在他親自率領下到北京組稿。我作為香港三聯書店的代表參加。首先訪問文物出版社。該社的社長王仿子先生不但是1939年就參加生活書店工作的「老三聯」，1946至1948年間且曾在香港生活書店工作過，是我們的老前輩。王社長知道我們的來意後，就毫不猶豫地囑咐工作人員拿出該社的選題計劃讓我們挑選。這份選題計劃的內容非常豐富，既有十分專業的（例如發掘報告之類圖書），也有十分普及的（例如書法碑帖），但是我只看中王世襄先生關於明式家具的專著《中國傳統家具的黃金時期——明至清前期》，認為這個選題既具學術水平，可出中文版，而且具備出版外文版發行到世界各地去的條件。為何我對這個選題感興趣呢？這與我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曾經在上海和北京從事過一段時間的外文圖書的進口工作有關，當時已知道上世紀四十年代北京一家由

法國人魏智（Vetch）開設的 Editions Henry Vetch，曾經出版過一本由德國旅華學者，當年在北京輔仁大學任教的艾克教授（Gustav Ecke, 1896-1971）用英文編寫的中國家具圖書：《中國花梨木家具圖考》（*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我在香港還獲悉魏智後來從北京移居香港，獲聘主持香港大學出版社，不久《中國花梨木家具圖考》英文版也由該社出版了香港版，行銷港澳和海外各地。這說明洋人早就有收藏家具的傳統和習慣，現在連中國家具也進入他們的視野了。

我即向王社長反映這部著作是否可以考慮由文物和香港三聯合作出版。王社長是十分支持香港三聯的，他就立即邀請王世襄先生到出版社與我會面。在我初步翻看了這部著作的書稿並與他詳談之後，發覺這確是一部前無古人的研究明式家具的學術專著，通過交談更增加了對王世襄先生的了解。原來他出身世家，抗戰時已獲燕京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抗戰後期又到抗戰後方，由中國著名建築學者梁思成安排他擔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直至抗戰結束。其間既在李莊從事野外調查工作，又研讀《營造法式》、清代《匠作則例》等古籍，對他後來從事髹漆和明式家具研究有很大幫助。抗戰結束後，他又為國家追討抗日戰爭時期被劫文物做了許多工作。但這部專著以文字為主，插圖的攝影質量也差，如原樣出版，效果肯定不好。因我對這個選題和作者都有信心，也懂得香港和海外讀者對這類圖書的編印要求，於是大膽提出新的出版計劃：建

議先請王世襄先生編一本以圖為主的大型畫冊，可先出中文版，再爭取出英、法、德等文版；打響第一炮後，再出版這部學術專著不遲。這個計劃得到文物出版社和王世襄先生的認同，於是作為兩個出版社的合作項目逐步落實，雙方還簽訂合約。這兩部畫冊分別以《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命名，這是後來擔任這兩部大型畫冊的編輯黃天兄提議，並得到文物出版社和王世襄先生贊同的。

為了出版《明式家具珍賞》打響第一炮，所有的照片都要按照國際標準的要求重拍。王世襄先生不顧已近古稀之齡，決心帶隊重拍。他搬出自己的藏品，又前往故宮和陳夢家等居處挑選各式典型的家具，供文物出版社專業攝影師拍攝。當時內地還十分缺乏專業用的攝影用品，所以菲林和攝影用佈景紙等都由香港三聯供應。香港三聯還經常派遣設計人員前往北京參與攝影工作，使拍攝成品的構圖和分色等符合國際大型畫冊的製版要求。總之，香港三聯為了這部書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這部《明式家具珍賞》大型畫冊的書稿終於在王世襄先生、北京文物和香港三聯三方的通力合作之下耗時一年多宣告完成。

當時香港三聯的編輯出版部門剛成立不久，尚欠缺能夠編輯面向國際的大型畫冊的人選。正好相識多年的黃天兄剛從日本學成歸來，我知道他的學養和工作經驗都足以主持這類畫冊的編輯工作。因為他早年曾在澳門當過記者，愛好閱

讀中國文史讀物，並精於書法，1977至1984年間，他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日本東京留學，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他留校在圖書館自修研習中日關係史年餘，每周又常到神田書店街淘書，是東京古書會館的常客，因而對各類圖書的內容、風格都有深入的認識和心得。同時他又參與二玄社《中國篆刻叢刊》（四十卷）的出版工作。二玄社是世界著名的書畫美術出版社，黃天兄參與其間，使他也學習到先進的出版業務。我早就歡迎他參加書店工作，這也是他的志願。當他1984年學成回來，我立即正式向他提出邀請。我們又為他以輸入人才的形式申請來港工作。1984年底接獲批准後，他就立即來港加入香港三聯，主持這部畫冊的編輯工作。果然，在他的主持下，在尹健文、馬健全、黎錦榮等編輯設計人員的配合下，只用了七個月時間就完成全部編輯設計工作。期間，他認真地研讀書稿，有不明或存疑之處，他必認真地以書函或電話向王世襄先生請教或商榷。有屬於出版方面的問題，也必逐一提出，分別與有關人員研究。兩部畫冊的書名就是他認真思考後提出的，都得到北京文物和王世襄先生的認可。由於黃天兄是這樣認真地處理這兩部明式家具畫冊的出版工作，他不但熟讀兩部畫冊的文字稿，而且無數次直接與王世襄先生書面請教，還曾利用因公北上的機會，直入王世襄先生芳嘉園舊宅，在滿貯明式家具的居室中請益和探討，甚至能提出王世襄先生也未考慮到的問題。由

黃天兄來編輯王世襄先生的著作可謂珠聯璧合。黃天兄完成這兩部大作的編輯工作之後，他亦可稱得上是一位明式家具專家吧！

第一部由國人自己編寫的《明式家具珍賞》大型畫冊終於於1985年9月在香港出版。我們邀請王世襄先生親自來香港主持設有小型明式家具展覽的新書發佈會。展品是向香港當地的藏家羅桂祥、梁鑑添兩位先生和伍嘉恩、袁曙華兩位女士商借的。這次新書發佈會轟動整個香港文物藝術界和新聞出版界，王世襄先生成為新聞焦點人物，各文物藝術團體紛紛邀請他演講座談，在一次有不少西人參加的聚會，王世襄先生以流暢純正的英語發言，令與會者大為驚訝。此外，黃天兄為該書的發行，還建議出版紅木盒編號特藏本二百冊，並請王世襄先生逐一簽名其上，又在蘇州訂製一批紅木家具小擺設，作為預訂讀者的禮品。結果遲來向隅，被預訂一空。這部當年售價港幣四百五十元的大型畫冊竟成為暢銷書。同年秋天連同已經由專家譯成的英文稿帶到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很快就達成英、法、德等三種外文版的協議，從1986年起陸續出版。而中文版除香港三聯版和北京文物版外，還出版了台灣版。

由於《明式家具珍賞》一炮而紅，王世襄先生最重要的學術專著《明式家具研究》，令讀者都翹首以待。因為《珍賞》賺了錢，香港三聯可以為這部專著的出版投入更多的資

金，而王世襄先生在國際學術地位的奠定和《珍賞》的暢銷，又保證了這部專著的市場。《研究》近三十萬言，插圖三百多張，圖版四百餘幀。黃天兄從內容和讀者閱讀方便來考慮，決定提高專著的出版規格，編輯成文字卷和圖版卷；精裝加護盒，並發動整個美術設計組投入細緻精準的裝幀設計工作。其時又加入了陸智昌，和之前的黎錦榮、馬健全等一同構思設計，《明式家具研究》終於在 1989 年 7 月在香港首發面世。《明式家具研究》先後出版中、英兩種文版，但這已是後話了。1986 年我就退休，以後的工作都是在黃天兄帶領下完成的，我在這裡唯有表示感激之情。

王世襄兩部明式家具專著版權問題的癥結

前文已經提到當時香港稿源嚴重不足，香港出版社直接向內地作者和文化學術單位組稿也是困難重重，於是想出與內地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辦法，由內地出版社提供稿源，香港承擔編輯設計的加工和印刷。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就開始這樣做，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出版社陸續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取得不少適合港澳台和海外讀者閱讀的書稿。其時，港澳台及海外正流行出版大型畫冊，我們先後與內地的中國建築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天津美術出版社等合作出版了《敦煌藝術》、《中國古建築》、《蘇州園林》、《西藏布達拉宮》、《中國園林藝術》、《天上黃河》、《藏傳佛教藝術》

等等，都很暢銷，而且大型畫冊也適宜與外國出版社合作出版英語等外文版。凡是已經出版內地版的書，一般我們都採取支付版稅的方式，凡是尚未出版的書，則採取由內地出版社供應已經編輯的稿件，再由香港三聯按照國際規格加工成書，在香港印刷後，以版稅、稿酬或提供印刷用菲林或印張（大型畫冊類一般都採取提供香港印刷的內頁印張，一般都均達一千至兩千冊）的方式代替版稅，然後在內地裝訂成畫冊銷售。至於內地編著者，因組稿者是內地出版社，所以均由內地出版社與編著者結算稿酬或版稅。這個辦法實施多年，達到了中港合作、優勢互補的作用。兩地出版者和內地編著者普遍接受，認為對各方都有好處。

為何出現版權爭議，如何解決？

至於我們與北京文物談明式家具兩書的合作出版事，王世襄先生也有出席參加，他當時十分興奮，對如何合作出版他也毫無異議，也許他根本不在乎這些，只滿足於由一本書改成兩本書，而且出版中港兩地兩個版本，更可以遠銷世界各地，他的多年研究明式家具的成果，終於可以吐氣揚眉了！正如他後來親筆書贈我的五言古詩條幅中的兩句話：「從此言明式，不數碧眼胡！」直至《明式家具珍賞》於 1985 年 9 月出版，我們邀請他親自蒞港出席首發式。在港期間，他也是興高采烈，從未提起有關版稅的事。

但是王世襄先生從香港回北京之後，眼見《珍賞》如此暢銷，以為香港三聯賺大錢，於是產生不滿情緒。我們也逐漸發覺我們原來與內地合作出版的方式對一般畫冊是可行的。但像王世襄先生那樣暢銷的畫冊，作者是吃虧了。其時，我已於1986年6月底退休，有關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兩書的出版事務均由繼任總經理的董秀玉女士（從北京三聯書店調來香港）和黃天兄承擔。後來由香港三聯和北京文物加簽了「會談紀要」，解決了爭議，並得到北京文物的讓步，改由香港三聯與王世襄先生直接簽訂《明式家具研究》的協議。香港三聯還在樣書方面盡可能滿足王世襄先生的需求。版權方面的爭執總算得到妥善的化解。

結論：合作成果大於一切

版權問題得到解決，王世襄先生縱有不滿，也僅一時。因為他看到自己窮一生的鑽研，通過出版，成為「明式家具學」的創始者，獲得全球文博界的讚譽，並榮獲這份榮耀。這份喜悅，應不至於再把過去的版稅問題放在心上。何況1986年補簽了「會談紀要」之後，王世襄先生便直接和香港三聯簽新合同，委託香港三聯編輯出版他那畢生研究結晶的《明式家具研究》，這完全是對香港三聯的信任。更進一步說，當早期香港三聯和文物簽訂的合作出版協議約滿後，王世襄先生又已謝世，他的哲嗣王敦煌先生對香港三聯仍然十

分信任，以承繼人的身份，直接和香港三聯簽訂新的出版授權合約。所以今天還談甚麼「無奈的合約」，是對事情沒有全面的掌握和了解。將舊案的枝節拿來翻炒，既沒有必要，並且以這樣的態度來看待香港三聯，對於當時香港三聯一批熱誠的編輯出版人員是十分不公道的。

兩部明式家具大型畫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約稿開始，迄今已逾三十五年。王世襄先生已經作古；我也年屆九十歲，退休迄今三十年，早已以書畫自娛。因偶然翻閱田家青的那本書，竟不由自主地撰寫這篇文章。我要在這裡再次強調，王世襄先生的兩部明式家具專著如果不是由香港三聯傾全力出版，其成果恐怕會大打折扣。當年除了上述支援拍攝外，我們光是分色製版費，已耗去十四萬港元，相當於當時普通家庭的半層房子的樓價。執行編輯這兩部巨著的黃天先生知之甚詳。他沉默了二十多年，在王世襄先生辭世時才寫出紀念文章：〈我為王世襄先生編經典〉，詳述《珍賞》的編輯出版過程，很值得一讀。去年底，他又為香港明式家具收藏家劉柱柏教授的藏品集撰寫〈緒言——明式家具從香港走向世界〉，揭示香港三聯書店是世界明式家具熱潮的推手，讀來令人信服！聞說黃天兄有意撰寫一本有關他為王世襄先生編經典的著作。以黃天兄和王世襄先生非比尋常的交往，當有許多鮮為人知的逸聞趣事。亟盼此書早日出版，有助我們更加了解王世襄先生與明式家具兩本經典的誕生過程。